

榆下杂说

黄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榆下杂说

黄裳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檐下杂说

黄裳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十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25-1211-8

I·589 定价：4.40 元

目 录

关于祁承燦·····	1
——读《淡生堂文集》	
不死英雄·····	10
——关于张缙彦	
关于周亮工·····	21
关于张远·····	28
齐如山的回忆·····	34
翻案文章·····	44
老板·····	53
爱书者·····	59
叔黻先生二三事·····	63
清刻之美·····	66
访书琐忆·····	75
《前尘梦影新录》前记·····	82
《清代版刻一隅》序·····	85
序《石头记会真》·····	88
三部书·····	93
张岱的《史阙》·····	100

几种版画书·····	105
《明月诗筒》·····	112
《天津杂事诗》·····	117
记《咏梨集》·····	120
《锦瑟》·····	126
晚读书记·····	132
关于《藏书纪事诗》·····	151
读画记·····	155
读《戏考》·····	161
《双行精舍书跋辑存》·····	164
《书林琐记》及其他·····	172
四印斋·····	177
雍正与吕留良·····	180
查·陆·范·····	189
清代的禁书·····	195
几乎无事的悲剧·····	202
避讳的故事·····	208
名教罪人·····	214
禁本小记·····	217
来燕榭书跋·····	232
祁承燦家书跋·····	247
书跋偶存·····	251
后记·····	262

关于祁承燦

——读《淡生堂文集》

蘇州葉翰林恒澹，晚年家貧自甘，於目錄學爲余師之第二人。

中国历代藏书家，总数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没有详细的统计。叶昌炽是最早做研究统计工作的人，他的《藏书纪事诗》也是一部开山之作。不过这书是以诗为主的，关于具体的个人，材料并不丰富，只不过是简略的小传和一些零碎的资料，对读者的帮助不大。继起而作藏书家事略的也有一些，但总摆脱不掉同样的缺点。大抵藏书家并非同时也是名人，也不一定都有自己的著作，传状资料也稀少，这些都造成了困难。

明代晚期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燦，是留下了不少书面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他进行较深入了解的一个例外。淡生堂的藏书，清初就散佚了。但今天我们还能接触到一些仅存的遗物，特别是他家的抄本书，还有那有名的藏书印记，看了都使人感到亲切。他的著作，在清代都是禁书，所以流传极少，但到底并不曾断种。他的传状，由范允临等手写的，现在也还在。他的手写、手跋本也多少还留下了几种。他的家书手迹更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珍贵的遗墨。这些遗藏的一部分原来是祁家深藏密锁了几百年的东西，直到解放之初才陆续流散出来。崇祯刻本《淡生堂文集》就是其中之一。

“澹生”

原集大约刻于崇祯中叶。刻成不久就遇到了甲申国变，所以流传很少。过去只在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初集中有过著录。那是陶湘的藏书，后来展转归北平图书馆，现在台湾。书前有陈继儒、范允临两篇大字序，范序做于崇祯六年（1633），可以约略推定刻成时代。接下去是十篇旧序，都是为承爍生前著作单行刻本而作的。作者有梅鼎祚、冯时可、邹迪光、姚希孟、杨嗣昌等，都是晚明有名的作者。这些单刻小集今天也大多亡佚了，只能从这些旧序中知道那些名目。《文集》是合编重订本。计诗、序跋、奏疏、记、读书志、传志、杂著、尺牍、吏牍等共二十一卷。

与这部《文集》同时流出的还有《淡生堂诗文钞》稿本四册，是祁家后辈从《文集》中精选写成的，待刻而终未刻。对比之下，可以知道《诗文钞》即据《文集》抄出。被删落的大都是有干时忌的处所。在选抄过程中还对《文集》动了手术，将“奴虏”字样都一一用浓墨涂去了。因此可以断定《诗文钞》写成的时代是清初。而在国变家难之余，祁氏子孙仍念念不忘想使先人遗著流传下来，又为了安全，涂去了触眼的忌讳，但并不销毁，一直秘密保藏着，即使经过乾隆禁书那样的大风波，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藏书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叶。

全书涂乙最多的是十七、十八两卷尺牍。有的篇章几乎是满眼墨丁。现在引一首《上赵明宇、高莹塘》书作例：

窃计中国之制夷狄，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其来。此为寻常言也。若今日则直须有以制其来，而战之胜不胜，守之坚不坚，又为第二着矣。何者？职见人心摇摇，略无固志，若一闻虏骑渡河，都门不知作何景状。故今日惟在海上多方出师，以扰其巢穴，老酋如恋栈之马，或未敢一意西向。所以海上之师，惟频益妙，正所谓胜固可欣，败亦可喜者也。前台臺防边八议，固以及此。职之惓惓一念，敢以附于临歧

康熙十年乙酉，溧兵下江南，祁氏諸子圖謀興復，事發，破家。
康鹿諸子傳佛，長子駿佳尤甚，家友常遺縋流，先澤尚自珍。

之献。

承燦在这里提出了对东事的见解。像这样的尺牍颇不少，但都不选入《诗文钞》中，那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篇中“中国”、“夷狄”、“虏骑”、“老酋”等字样都涂去了。在其他诸篇中涂去的还有“建酋”、“辽左”、“四卫”、“奴酋”等字样，甚至连叙述战事的词句也一并涂去。直到今天，我们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氏子孙翻阅先人遗著时惴惴的心。

祁承燦一直在宁国、长洲、吉安、宿州、磁州等地做地方官，在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方司任职，平生精力大部分耗于吏治，这在两卷《吏牍》中可以见其大略。不过他到底是一个爱书的人，在藏书上花费的精力尤多。卷十四为《读书志》一卷，其中的《藏书训约》、《训略》，缪荃荪已经刻入《藕香零拾》中。这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家居时所作，是检阅藏书、分别部居以后写下的有关藏书总结性的文字。其中《整书例略》部分，是有关图书分类的论文。他提出的收书要点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举自己收书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又罗列古今藏书家的故事激励子弟。这一卷《读书志》可以算得是系统论及藏书的开山之作，给予后来者的影响是大的。只清初藏书家孙从添的《藏书纪要》约略可以相比。他当然逃不掉“子孙世守”的老思想，声明在他自己生时，要每月增添藏书的种类，对子孙则只要求每年增加若干种。还详细规定了藏书楼的规则，但他似乎也感到无论如何细心规画，藏书是否能守而勿失也还是个未知数。他说：“至竭力以守，而有非尔辈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数存乎其间矣。”他所说的“数”自然是唯心的，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知的事物。没有多久，甲申国变，祁家随之破家，藏书自然也不可问了。其实世变的发生与发展，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早已多次涉及，只是没有料到来得如此急速而已。

夷寇印記
欣然忘飲食
典衣市書恒不給
後人但余阿翁癖
子孫

祁承燦说他自己特别看重的是史书，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藏书思想。在以尊经为主要的时代，是一种难得的卓识，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一种特色。他回忆少年时的故事：“然性尤喜史书，生欲得一全史，为力甚艰。偶闻华容魏学博有《全史隐括》颇悉，郭相奎使君以活板模行于武林者百许部，一时竞取殆尽。遂亟渡钱塘购得其一，惊喜异常，不啻贫儿骤富矣。”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同时又又可以知道明末在杭州是有活字板的，至于这部全史的名目则已不可知。当日活板印书大抵一次只刷印一百部左右，随即拆版，这是活字本特别罕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祁承燦很早就有著述的志向，也大抵是属于史部的居多。在南京时有《致管席之》一书，略云：

白下山川自佳丽，寒暑自寂寞，惟堪闭门读书，自快蠹鱼之癖，日来喜阅古人嘉言懿行，意欲自三代至国朝，将名哲品格之可采者，辑为《古今范》，勒成一书，藏之名山，吾意足矣。但业须遍索之正史、稗史之间，偶于记闻得数种，皆此中藏书家所绝无者。或宅上邨架中一检，不妨借阅。录竟即专人函璧。

为了著书而向人借书，借得以后即抄成副本，淡生堂的抄本书，就是这样陆续积累，终于成为巨观的。

他在《与郭青螺书》中，又劝他为吉安一郡编文献志，建议“采之豫章全书中，已十得其六七；若文，则采辑名公之著作，亦易事也。……所以文献一书，关系不浅。望老公祖慨然力任之。一应笔札刊刻之资，则郡吏事也”。明人任地方官，多喜编刻有关地方史志类书，其中有不少是所谓“书帕本”，是附庸风雅的草率之作，但也有谨严的撰著，无论如何，总是为地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在这信的后半，他又提出了借书的请求：

某表彰前哲之意，颇亦不敢自后于人。即书架中所收

然据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通书记”我，罗困良为购书事与黄南雷、吴孟举绝交，所为颇失于厚道，为时人所垢病，似乎也不该是君子该做的事。

祁氏藏書後屬梨州，晚村大相買去，留良為此作詩兩首，「阿翁銘詞侃之，子料自己後人所歷之厄之梁。」

子辨

誤甚，余素習於書，局間大故厥詞，讀是書正半夜，夏
此屬借書，非新購也。後讀諸公見諫，余嗜痂之癖

後讀諸公見諫，余嗜痂之癖

諸公見諫，余嗜痂之癖

公見諫，余嗜痂之癖

鬼域大方，

懷經數頁
惶5恐素

感到个人的力量究竟有限，自然不免想到要联合起来共做收集的工作。这是图书馆思想的早期萌芽，虽然粗略，也没有脱出个人收藏的局限，但到底是可贵的初步设想。

《文集》卷十八有《与潘昭度》一书，长达千言，是论藏书的重要文献，可以看作《读书志》的提要。其中说：“大约觅书如觅古董，必须先具赏鉴，乃可称收藏家。若只云漫尔收藏，则篋中十九皆贗物矣，虽多奚为。”他主张以《文献通考》和《艺文志》所载者为第一格，著述中又应以表章九经者为第一格，“次之则记载前代治乱得失事，再次之则考证古今闻见所未及事”。对诗文集则评价不高，但说汉、唐、宋、元人集亦应珍重：“故弟于文集中，凡宋元人遗稿，倘得寓目，亦无不抄录而存之。盖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处。惟听宇宙之所自为销磨，则经几百年而不销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淘汰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规律。人们常说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难，其实历史地看，这还不算是严重的祸患。推而广之，就连“文革”中的毁灭文物也不是最致命的症候。读者的鉴别、筛选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坏书、不够格的低劣作品往往逃不过无情的抛弃，要不然真是以大地为书架也将容纳不下了。相反，好书、好作品的生命则是长久的，即使遭遇怎样的厄运，终于还是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得到了读者、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读者的批准和保护。

在《与潘昭度》信中还提到搜求会试录事：“我朝会试、廷试二录，自开科至今，其板俱存礼部。此昭代大典，藏书家不可不存。知兄亦须办此，并为弟刷印一部。但一科不可使缺。所刷者即留之都门，弟自差人来领，至嘱。”登科录是原始的历史资料，不过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在这里可以看出祁承燾的眼光识见。同一时代以收藏登科录著名的还有宁波范氏的天一阁，至

今还大量地保存着，比淡生堂要幸运得多了。这种登科录，并非一本本零碎收集，而是整套地从礼部刷印得来的。

祁承燦还打算修河北三郡的地方志，请阮太冲主持编辑：“不佞欲合河北三郡为一志，名为《河朔外史》，而体裁不同于郡乘。”（《与竹居宗正》）在《与陶公望》书中更详述自己著述的计划，是重要的史料：

弟今老矣，……惟好裒辑古人之遗书，表章前哲之遗范。……故如《绍兴文献志》、《两浙先辈盛德录》、《越中隐佚考》之类，皆有志而未能者也。如《世苑》、如《友鉴》、如《前贤大事案》之类，皆已辑而未就者也。惟自通籍二十余年来，回环郡邑之间，曾辑有古今守令之事，足为后人取法，名曰《牧津》五十卷，分为三十类，于弥变安民化导肃法之事，颇为详尽。此书或于世有小补乎。至于两浙著作之考，为卷亦六十有四，于吾乡前辈之著述，无不备载其名目，第尚恐有遗于耳目闻见之外。此二书者虽已成卷，然更当请裁于兄者也。

从这些已成未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著述旨趣，也还是着重史的因素为多。特别重视的是地方史乘，这与他在《读书志》中所说是一致的。

《淡生堂文集》的前六卷是诗，如细细排比，可以得到不少传状的资料。不过就诗论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文集》中最别致也最有趣的是收于卷十二、十三的几种日记：《数马记》、《出白门历》、《江行历》、《归航录》、《戊午历》、《己未历》。其中有的是南北行旅的记事，也有家居琐记。这中间说到访书的很不少，很可以看出他毕生收书的情况。现在从后面四种日记中择录几条，可以约略看到大致的面貌。

七日，密云不雨。早至姚江，市书七种。内有于文定公

《读史漫录》，大有识力。《乔庄简集》，亦简令有体。舟中读之甚畅。午后雨甚。（万历四十六年正月）

十日，风雪俱狂。舟泊四明邮亭，推篷四望，大雪弥漫无际，欲觅友人作白战不可得。呵雪水研墨作诗，复检甬东所市书二十余种。内有熊仁叔《象旨决录》，此我朝解经第一手，觅之数年，如渴得饮，急取读之。时雪从篷隙入，遍满几席间。余以一毯褥拥身，都忘风雪。因跋为辟寒编。（万历四十六年正月）

二十二日。有贾人持蠹余残书来，市得三十余种。内有陈植《木钟台》，此宋人解经史语也，颇类王伯厚《困学纪闻》，不免作头巾气耳。他如杨铁崖《史义拾遗》及新刻张献公《曲江集》，皆佳本也。（同上，二月）

十五日，得范元辰年兄寄示《天一阁书目》，并见贻司马文正公《稽古录》。此书大约与吕成公《大事纪》相类，晦翁独称其简要有体，恐亦公编摩通鉴后所成也。（同上，四月）这是见于纪录的《天一阁书目》的最早本，也即著录于《淡生堂书目》中的一本，可惜已不可见了。四明范汝梓，是天一阁后人，曾为承燦《初集》撰序。

二十一日。贺新郡公张泰符公祖。是日闻奴酋突发，抚顺失事，大帅与全军俱没，辽事几不可为，为之堕箸。余自园居以来，终岁不闻除书邸报，至是亟索近报，不胜菽食之忧，取古人应卒制夷之略，为作《辽事案》。（闰四月）

士大夫居乡，但仍不能不关心国事。不过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故书中寻找有关文献，加以纂辑论述而已。晚明这类著作颇有一些，虽多不免空疏之病，但究竟是时代风云的反映，禁毁之余，都是值得珍重的。

初九日。晒书毕。数日来余躬率平头奴三四人，刷蠹

理朽，挥汗插架。由朝及暮，瞬息不停，真所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同上，六月）

过书肆觅书，得十六种。内如宋人方秋崖集，极佳。又抄本《越峤书》，载交南古今事甚悉，得之欲舞。（八月）

十五日。与郑孔肩坐湖中小艇快谈极畅。是日同过黄贞父寓林，树老石奇，是湖中第一境。沿堤至西泠，复至孤山。又携手过葛岭。阅闵氏朱刻书四种，精工之极。此简编中清玩也，孔肩戏呼为书妖。天色已暮，始从钱塘门归寓。至寓则居停主人已治具集儿辈待月矣。至漏下二鼓乃罢。（八月）

这是游杭的日记。闵氏朱墨套印本书，过去一般不为藏书家所重，以为不过是给儿童阅读的坊本。但在祁承燦看来，则是精工之至的雕版书，大加称赏。这也可以算是藏书佳话吧。

1987年10月23日

不死英雄

——关于张缙彦

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淘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像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统系。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一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

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

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无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驶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一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